

大学文化哲学

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

◎ 王冀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大学文化哲学

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

◎ 王冀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王冀生著. —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 - 7 - 306 - 04147 - 0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文化哲学—
研究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142 号

出 版 人：祁 军

策划编辑：徐诗荣

责任编辑：徐诗荣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廖丽玲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84110283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960mm 1/16 18.25 印张 271 千字

版次印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500 册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王冀生 安徽省庐江县人,193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市,1952年8月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师资研究生班学习结业并留校任教,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原第八机械工业部(总局)教育局副处长、处长,教育部(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二司)处长、副司长、正司级巡视员和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正司级)。

1981年11月到教育部工作以后,主要结合工作进行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重点是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估研究。曾主持和参与主持“新时期高级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及其应用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

的研究”等多项国家教育科学“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已经出版的专著或参与主编的主要著作有:《高等工程教育概论》(王冀生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王冀生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王冀生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张光斗、王冀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廖叔俊、王冀生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王冀生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94年退休以后,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基本问题,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基金项目“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宏观高等教育学》(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现代大学文化学》(王冀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大学之道》(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大学理念在中国》(王冀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担任《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总主编。

在教育部工作期间,主要兼职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二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学科组成员,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第一届全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和第一届全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从2002年9月起应聘担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至今。

内容提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人们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导致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均出现了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当今时代强烈呼唤我国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本《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就是在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深入发展并进入到文化和精神领域时，作者继《现代大学文化学》（2002）、《大学之道》（2005）和《大学理念在中国》（2008）之后撰写的一部新作，重点是在深刻揭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的本质及其哲学根源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既汇集了中外众多教育家和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十多年来进行大学文化问题研究的学术总结，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本书论述的主要问题有：大学本质和文化使命，高深学问和文化个性，教育本质和人文化成，探求未知和创造未来，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价值危机和文化觉醒，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国家兴衰和大学兴衰，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中国特色和综合创新。可供大学校长、大学教师、教育管理干部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学习和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设置的高等教育学科学生和培训大学校长、教育管理干部的教材。

序

2002 年的阳春三月，王冀生同志找到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惠坚同志，希望由清华大学牵头组建一个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方惠坚同志推荐由我来做，因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在从事教育研究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到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是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成为了这一倡议的首位积极响应者。不久，北京大学的赵存生副书记、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郑惠坚副总编（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志鹏社长的委托）也积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来。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的支持下，2002 年 9 月 1 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清华大学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创举。袁贵仁同志亲自到会并发表了既富有深刻哲理又有现实针对性的讲话，指出：“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研究大学文化，有助于准确把握大学的本质、使命和责任，有助于全面了解不同国家大学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类型大学的不同文化风格，不同层次大学的不同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研究大学文化，有助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①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后，明确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轮流出任轮值主任，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任常务副主任，我为首届轮值主

^① 袁贵仁：《加强大学文化研究 推进大学文化研究》，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02 年第 10 期。

任，王冀生同志应聘担任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后来又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十年来，我和冀生同志以及其他众多学者一起共同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之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这期间，尽管我和冀生同志彼此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是，总体方向和基本理念有很多的共识，合作是愉快的。

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大学文化，什么是文化哲学，什么是大学文化哲学这一系列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的重要概念。由于文化现象和人们视角的多样性，仅对于“什么是文化”就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的界定。当今影响广泛并得到较大认同度的是英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于1871年给出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①。王冀生同志经过研究提出的关于大学文化的界定则是以大学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担的文化使命为出发点的，他认为“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肩负着文明守卫、人文化成、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的文化使命。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大学文化做了如下的界定：“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是以大学精神文化为核心和灵魂的，由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构成的一个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有机的整体。”随着大学文化研究逐步进入到哲学领域，王冀生同志进一步把大学文化界定为“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并以此为核心初步构建了一个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标志着他对大学文化本质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力求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索和回答大学文化理论 and 建设问题。

王冀生同志这本《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

^①（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种信仰》的问世，不是偶然的。新世纪伊始，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适应的便是文化哲学思潮的进一步兴起。文化哲学是对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的理性思考，是对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解和历史阐释，是一种文化理论研究的范式。这种哲学理解和历史阐释，对于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德国民族在19世纪前半叶热衷于实际操作而摒弃哲学理论，沉溺于形而上学的现象，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于哲学对人的文化行为具有价值规范和思维导向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必须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在《当代文化哲学》一书中指出的：“面对21世纪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该体现人类文化创造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文化哲学的理论构建不应是悬浮于社会实践之上的抽象理性活动，它应以关注现实人类生存和发展为自己的第一要务。”^① 当今，我们面临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提升文化自觉、加强文化建设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也体现了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人们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迫切追求。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哲学研究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体现在文化自觉的需求，也是哲学理论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文化，同样需要对以往和现实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实践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思考，以提升大学文化建设理论的深刻性、批判性、历史超越性与前瞻性。这是大学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促使大学文化建设沿着理性方向前进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文化哲学自身是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将理想社会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所以，文化哲学在教育工作上有着特殊重要的现实需求和突出针对性。因此，开展大学文化哲学研究，对大学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有灵魂性的作用。

^①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当代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高度来界定文化，把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这也是王冀生同志论述大学文化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之所以出现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哲学根源主要是由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日益加剧，出现“科学理性”偏离“人文目标”的价值冲突，其本质是“人”日益丧失了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使人“生活在物质丰富、心灵贫乏之中，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根本出路是以“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回归“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反省和价值整合，进一步确认“坚持‘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应当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

我要强调的是，大学在完成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过程中，应当努力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极力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这既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的需要，也是通过教育发掘人的全面潜力，使人全面成长的需要；二是将发展人的精神生命的主动权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作为转变教育思想的重要目标，也作为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前提与内涵，其核心是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人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中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特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上面提到泰勒将文化定位为“复杂整体”，正如邹广文所指出的，“整体性是文化的精神血脉”，“在今天人们之所以开始关注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是因为全球现代化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物质、工具与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维度，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全部价值内涵。这种倾向导致文化被切割成碎片，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被肢解了”^①，出现了人成为哲学家马尔库塞所指的“单向度的人”和建筑大师梁思成所批判的“半个人”的现象。而实际上文化和价值是

^①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15页。

不可分割的，特别是文化哲学作为人类文化追求整体性时代的哲学表现形式，对于文化整体性消解现象具有抵制和导引作用。王冀生同志在《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一书中涉及的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文、大学存在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基础、育人为本与科学为根、探索未知与创造未来、科学理性与人文目标、大学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中国特色与综合创新等，均是对文化整体性的一种辩证思考与追求。

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和解决人类在文化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大学文化哲学则要回答和解决好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2002年4月《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出版到这本《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王冀生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他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自觉和满腔热情，勤于思考、矢志不渝的求真精神和锲而不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成为拉动许多参与者持续开展大学文化研究和实践而对其难以舍弃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深知，要深刻回答和解决好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尤其是大学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持续的努力。我们感谢王冀生同志发挥的开拓性作用，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教育管理者参与这一探索过程，以将我国大学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胡显章

2012年4月于清华园

大学文化沉思录

(前言)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最值得选取的生活是“在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起因和终极目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人们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今日的大学，导致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均出现了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危机，当今时代强烈呼唤我国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从 1996 年起，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的强烈向往驱使着我下决心集中精力对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使命，特别是对现代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进而对大学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思考，认识逐渐有所提高，其实质是一个文化觉醒过程。

从宏观上说，十多年来，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96—2001）：探索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使命

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传授知识和教学育人作为自己应当承担的基本职能，自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教育责任就成为大学应当承担的永恒的第一社会责任。因此，要办好大学必须要办好教育，要探索现代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必须要探索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和

使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世纪之交的严峻挑战和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以 1995 年教育部提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为开端,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思想大讨论。随着这场教育思想大讨论的逐步深入,从 1996 年起,我先后发表了《时代精神与教育观念》^①、《跨世纪人才的主要特征》^②、《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③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④等多篇论文。集中起来,这些论文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使个体社会化”是教育的核心和基本要求,文化传承和创新是教育“使个体社会化”的基础。由此可见,“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关键是通过“文化内化”促使受教育者实现从有知识的人向有文化的人的深刻转变。

第二,19 世纪初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逐渐演变成为在完成高中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一种专门教育,以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20 世纪初叶,针对高等教育工作中日益明显地出现的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主义倾向,人们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最初构想,它既继承了古典人文主义“注重开发人的理性”的教育理念,又与工业经济时代需要的专业教育相结合,促使大学生成为工业经济时代所需要的理性与专业和谐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第三,注重提高素质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以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宗旨的”教育观。人的综合素质由人的基本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共同构成,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品德、学识、智能和体魄四

① 王冀生:《时代精神与教育观念》,载于《上海高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② 王冀生:《跨世纪人才的主要特征》,载于《高教探索》1997 年第 3 期。

③ 王冀生:《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载于《中国高等教育》1999 年第 4 期。

④ 王冀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00 年第 7 期。

个方面，品德在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中居于首要位置，学识是人的基本综合素质的根本，智能是人的基本综合素质的核心，体魄在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中居于基础的地位。基本综合素质既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根本，也是进行专业素质教育的基础。

第四，现代大学教育的崇高使命是面对世纪之交的严峻挑战，以“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为指导，坚持以“人文、科学、创新的统一”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从总体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未来的新社会提供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教育，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在高尚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科学素养的基础上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

从探索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使命的过程中，我逐渐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大学教育的灵魂是理念和使命的确立，现代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本质上是个文化育人过程。这个探索过程，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后来撰写《现代大学文化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 第二阶段（2000—2002）：探索和构建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

高等教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仅仅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本体”，其他问题是“别人研究的领地”；第三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既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由众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第二种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比较重视对高等教育“本体”的研究，忽视对大学这个教育和办学“主体”的研究，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对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

经过一段时间认真的研究、探索和思考，我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

高等教育既是一种独立的教育门类又是一个广泛的活动领域。主要依据是：第一，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整个高等教育活动的核心和基础，它是有别于中小学教育的一种独立的教育门类；第二，为了确保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社会所要求的，必须建设与一定社会需求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第三，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作为“个体”的大学是教育和办学的主体；第四，为了保证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政府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的宏观指导和管理。上述四个方面的活动又可分为两个领域：办好大学和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属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微观领域，主体是大学；加强政府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建设与一定社会需求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属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宏观领域，主体是政府。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矛盾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发展需要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高等教育活动中宏观与微观两个领域、大学与政府两个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促使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和作为“整体”的社会需求协调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1995年初，我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年会上提出了建立宏观高等教育学的设想，这个发言后来以《要重视和加强宏观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为题刊登在《高教探索》1995年第2期上。接着，我又在《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宏观高等教育学的思考》一文。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宏观高等教育学》于2000年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对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对象，我专门撰写了第二章“现代大学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明确地提出“现代大学的本质是在积淀和创造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传播、应用、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具有“坚持以高深学问的教学为主”、“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结合”、“坚持学术自由”和“坚持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四个主要特征，为探索和构建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宏观高等教育学》出版以后，紧接着我在《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上撰文《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对现代大学的研究》，从“现代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和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现代大学的本质和办学规律”、“现代大学的领导管理模式”和“现代大学学的基本框架”四个方面初步论述了建立现代大学学科的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努力，2002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方面的开篇之作《现代大学文化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最后终于选择了从时代的高度和文化的视角撰写这本《现代大学文化学》，主要出发点是逐步意识到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正强烈地呼唤新的大学理论和现代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主要依据是：第一，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第二，现代大学与人类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本质的联系；第三，当前大学精神的衰微现象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话题；第四，人才和大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应当说，《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出版，从宏观上初步构建了一个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了一门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崭新学科，这是我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3. 第三阶段（2002—2008）：探索大学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大学理念是人们关于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念创新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逐渐出现了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时代强烈呼唤当今大学，特别是我国大学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基础上进行理念创新。

在这个宏观背景下，2002年上半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大学通识教育暨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学术研讨会”上，我以《文化觉醒和理念创新》为题作了大会发言，明确地提出“当前大学精神衰微

现象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列举了当前我国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的突出表现，并且呼吁当今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和进行理念创新。接着，我又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2003 年年会上作了大会发言，系统地提出了当前人们广泛关注的“大学理念创新研究前沿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 年第 4 期上撰文《文化是大学之魂》，对大学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几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努力，2005 年 8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大学文化问题学术研究方面的第二本学术专著《大学之道》。这本《大学之道》是继 2002 年 4 月出版的《现代大学文化学》之后我的一部新作，既学习借鉴了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又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进行大学理念创新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内涵。

我国的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更迭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过程，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伟大时代。因此，认真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科学地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尤其是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探索中国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之路，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工作。基于这个认识，2002 年我在《高教探索》第 4 期上撰文《中国大学理念研究》，简要地回顾和总结了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接着，经过认真的酝酿、论证、筹备和申请，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牵头，由一批有百年左右历史的老校和若干所近代以来有重大影响的名校共同承担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被正式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规划基金项目”。值得高兴的是，经过五年多来的艰苦努力，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